

## 论杜勃罗留波夫文学思想的革命性

彭永涛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作为 19 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代表与现实主义文论的重要推动者, 杜勃罗留波夫继承并深化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文论传统与唯物主义美学思想。他不仅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核心创作准则, 凸显了作家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决定性作用, 彰显了革命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实践价值, 更将“现实的批评”确立为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与准则, 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革命性思想贯穿于杜勃罗留波夫美学观、文艺观与批评观的始终, 既成为评价当时俄国文学创作的一种原则, 也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 对俄国乃至欧洲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杜勃罗留波夫; 人民性; 革命性; 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并称为 19 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的“三巨头”, 共同奠定了现实主义文论的基础。别林斯基提出的“形象思维”、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生活”、杜勃罗留波夫提出的“现实的批评”, 这些核心理论命题在文学的哲学根基、文艺理论建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及美学主张等方面, 构成了清晰的传承脉络。三人始终强调文学的民族性、现实性、典型性与人民性, 既坚守历史维度的批评原则, 也秉持现实导向的创作手法。三人虽都将文学艺术视为现实的反映, 但在文学与现实的契合深度、价值指向等问题上有着显著差异。别林斯基虽批评了各类唯美主义思潮, 但其早期批评思想仍植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车尔尼雪夫斯基虽将长期受黑格尔唯心主义主导的美学理论移植至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框架下, 但其以人本主义为内核的美学主张, 仍存在内在局限。步入新的时代语境后, 杜勃罗留波夫在继承二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予以批判性扬弃。他“接受了另一种哲学思想, 那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避免了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思辨性”, (邱运华 2015: 262) 最终完成了从“主义模式”批评到“实证批评”的范式转型, 尤其是其《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黑暗王国》《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四篇经典批评文本, 更是将俄国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推向了新的高度。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俄国正深陷剧烈的社会变革与尖锐的阶级矛盾之中: 克里木战争的溃败、专制君主尼古拉一世的病逝、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 直至 1861 年农奴制废除, 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重塑了俄国的社会格局。“严重的权力腐败, 普遍的贫穷和司法不公, 底层人民的苦难, 无辜者的眼泪, 凡此种种, 无不折磨着俄罗斯作家的良心, 刺激着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感”。(李建军 2017: 5) 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剧变, 构成了杜勃罗留波夫文学

批评观与政治文论思想生成、发展的核心现实语境，而他身上秉持的圣徒式苦修精神与对底层压迫的强烈反抗意识，更赋予其革命民主主义批评思想鲜明的战斗性与革命性。正如他在1857年的日记中直言：“我是一个极端的社会主义者”。（Жданов 1955：227）从思想立场来看，杜勃罗留波夫堪称反对农奴制、沙皇专制与资本主义剥削的无畏斗士，是列宁所评价的“痛恨专制、渴望人民起来反对‘国内土耳其人’，即反对专制政府的作家”。（列宁1986：290）在他看来，唯有将革命性思想融入文学创作，方能唤醒民众的人民性意识，唯有通过人民革命，才能构建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他将文学批评中的革命性思想视为抗争专制统治的精神武器，将启发民众投身革命斗争视为毕生使命，“他因热爱人民而燃烧”（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由此可见，从19世纪俄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与阶级立场出发，杜勃罗留波夫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首要身份是革命家，其次才是思想家与文学批评家。其在哲学、美学、史学与文学领域的理论探索，本质上都是革命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核心目标在于探寻科学的革命理论，为俄国革命运动提供思想指引，最终实现俄国人民的精神解放。正是这一革命家底色，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注入了革命性思想内核，即坚定立足人民立场，深刻批判社会现实，积极传播革命理念，坚决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植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性思想，深刻贯穿于其美学原则构建与作家世界观评判标准之中，最终催生出“人民性”的批评立场与“现实的批评”的理论主张。

## 2 民主主义美学原则的革命性

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与忠实的革命民主主义信仰，是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观的核心支柱。立足这一根本前提，他在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中始终坚持文学与现实的深度联结，明确文学批评“以服务革命为目标、以唤醒民众意识为方向”的价值取向，系统阐释了美学与文学理论的诸多关键议题，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体系。在继承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艺美学核心观点的基础上，杜勃罗留波夫为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最终成型确立了具体创作准则，推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别林斯基旗帜鲜明地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提出艺术不仅要真实再现生活本貌，更需承载推动现实变革、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使命。他在与“纯艺术派”的论战中奠定了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根基，开创了俄国文学史的崭新阶段，使“冷静观察社会现实、深刻揭露社会矛盾、尖锐批判社会弊病”成为时代文学的核心任务，也因此被列宁誉为“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列宁1960：183）与别林斯基相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立场更为激进，他提出“美是生活”的唯物主义美学原理，为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列宁评价其“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列宁1960：205）并“把俄国引上公开的阶级斗争大道”。（列宁1960：251）杜勃罗留波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道，继承并坚定捍卫了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传统。而杜勃罗留波夫骨子里的革命性特质，使其批评实践兼具更为昂扬的战斗激情、更为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以及更为鲜明的现实问题导向，更善于通过文学批评回应并探索社会重大议题，凸显了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品格。

从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再现”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美学原理，再到杜勃罗留波夫“现实的批评”主张，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演进脉络清晰呈现出“现实品格与革命精神逐层强化、对革命胜利的诉求日益迫切”的核心特征。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杜勃罗留波夫深刻阐释了文学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不是生活按照文学理论向前进，而是文学随着生活的趋向而改变……相反的情况是不会有。要是有时候你似乎觉得，好像生活正按着文学上的见解走，那么这是幻想，这种幻想是由于我们往往在文学中才第一次发现有一种我们所不曾留心，但早已在社会中实现的运动”。（杜勃罗留波夫1961：130）这一论述精准揭示了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核心原则，即文学源于生活、服

务于生活变革，其战斗性与革命性特质并非抽象的理论诉求，而是贯穿杜勃罗留波夫美学思想始终的精神内核，并集中通过其文学批评实践得以彰显。

其一，在美学原则的哲学根基层面，杜勃罗留波夫坚决批判索洛古勃、波多林斯基与波隆斯基等人主张的“纯艺术”唯心主义美学思潮。他认为文学本质上是认识与反映现实的重要载体，是通过形象体系认知、评判并再现生活的特殊文艺形态，“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是它的生活真实”，文学绝非仅映射社会现实的被动镜像，更应全面“把握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触及“社会现象的本质”，（杜勃罗留波夫 1961：174）主动介入现实生活、推动民众觉醒，激发人们对真理与善的追求。其二，杜勃罗留波夫高度强调文学对现实变革的参与性，凸显其宣传革命的功能性价值，即文学的“功利性”指向。他直言：“文学是一种服务的力量（它的意义是在宣传，它的价值决定了它宣传什么，它是怎样宣传的）”。（杜勃罗留波夫 1961：360）基于这一认知，他深入剖析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革命性特质与宣传功能，在批评实践中直言不讳地揭露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与剥削内核，主张通过人民革命重构社会制度、推动历史进程，将在“人民群众中很好地推广教育和合理倾向”作为文学的最主要作用，把“艺术和哲学作用全部发挥在这些方面，唤醒人民的沉睡力量”。（杜勃罗留波夫 1961：142）其三，杜勃罗留波夫主张文艺创作与革命政治斗争深度融合，凸显艺术的社会功能与思想内核。在他看来，文学的社会意义集中体现为批判旧制度与旧秩序的不合理性，揭露并匡正现实中的黑暗与弊端，启示并呼吁民众奋起反抗专制统治，宣传并描绘公正平等的新世界图景。由此，他明确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堪称社会变革的“晴雨表”，而文学作品中蕴含的革命性思想，正是这一“晴雨表”的核心指针，为民众指明社会变革的方向与路径。

### 3 关于作家世界观的革命性

作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清晰地认识到文学之于现实的关键社会功能。他不仅将自身文学实践自觉纳入民主革命的政治斗争框架，更强调革命化创作世界观对作家的核心价值。他在论述中明确强调：“一个在自己的普遍的概念中，有正确原则指导的艺术家，终究要比那些知识文化水平不高或向错误方向发展的作家来得有利，因为他可以比较自由地省察他的艺术天性的暗示……那时候现实生活就能够更加明白，更加生动地在作品中反映出来”。（杜勃罗留波夫 1954：174）在他看来，文学家不应仅止步于“艺术家”的身份，更应成为一名“人民的艺术家”，一名坚守创作原则、真实再现生活本貌，并通过作品传递革命性思想意涵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主张：“要把担当着人民的自然的、正确的追求这一种代表的作者，跟那些变成各种虚伪做作的倾向和要求的代言人的作者分别开来”。（杜勃罗留波夫 1961：363）而真正能承载“人民的自然的、正确的追求”的文学艺术家，首要前提是贴近民众、洞悉民情，能够契合民众诉求、呼应人民期盼、传递底层心声。要实现这一点，作家必须确立人民立场的世界观与革命导向的价值坐标，将创作内容与反映现实深度绑定，将创作目的与政治斗争紧密衔接，以呼唤民众觉醒、推动民族解放、助力革命运动为文艺创作的核心旨归，以批判粉饰现实、揭露麻痹群众、反对专制统治为文学批评的核心指向。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杜勃罗留波夫将“为艺术而艺术”流派的创作视为传播反动思潮的载体。在他看来，秉持此类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作家，其创作具有病态性、虚伪性与危害性，是阻碍革命进程的桎梏，更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落伍者。唯有将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作为创作的基本准则，将革命性文艺批评作为核心原则，方能成为真正意义上“人民的艺术家”。

与此同时，在文学反映现实的核心议题上，杜勃罗留波夫提出了衡量作家与艺术家创作才能的核心准则：“只要拥有一种能够体会和描写生动逼真的真实现象的本领，那么由于这一种承认，他的作品就使人有充分的理由，去探讨唤起作家写出某一种作品的生活环境，探讨它的时代。在这里，衡量作家才能的尺度就是：他所概括的生活的广阔到了什么程度，他所创造的那些形象，又是怎样巩固和包罗一起的”。（杜勃罗留波夫 1954：249）在他看来，

作为时代代言人的作家，不应仅具备反映现实的才能，更需确立兼具广度与深度的革命性世界观。文学创作不应止步于对旧体制、旧秩序的批判与揭露，更需在作品中传递呼吁人民奋起反抗农奴制的思想倾向，塑造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式的典型形象，为争取“真正的白天”而抗争的进步力量代表。进一步而言，杜勃罗留波夫强调，作家的创作才能随社会变革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他明确主张：“现在我们需要，不是那些越来越‘高出于周围现实’的人，而是那些把现实本身提高到——或者教导我们提高到我们已经认识的理性要求的水平上的人。总之，我们需要实践的人，而不是抽象地、永远是伊壁鸠鲁式地议论的人”。（杜勃罗留波夫 1954：230）在他看来，文学的创作宗旨不仅在于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更应该彰显其战斗品格与革命性作用。真正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必然源自兼具才能与立场的作家，这也就要求作家在创作观念中要确立为人民革命奉献的坚定倾向性，树立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世界观，以笔为刃、以文为旗，将文字转化为最具力量的宣传武器，切实唤醒人民追求幸福的勇气与投身革命的热情。

杜勃罗留波夫还通过辨析艺术家与哲学家的本质差异，深入阐释了世界观与创作实践的复杂辩证关系。他指出：“作者的一般信念……有时还没有和他的艺术天性从现实生活的印象中所体现出来的东西，达到完全的和谐”。（杜勃罗留波夫 1954：268）在他看来，哲学家依托严密的科学思维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而文学家则具备更为敏锐的艺术感知力，能够以天性洞察哲学家需通过理性推导方能揭示的真理。作家的世界观越精准深刻，其作品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映照便越透彻。与哲学家相比，艺术家“虽然没有在理论上揭示这种事实的思考能力，却会热心而好奇地注意着它，孕育着它，直到最后创作出了典型”。（杜勃罗留波夫 1954：164）反之，若艺术家的世界观局限于个人生活范畴与个体经验维度，便会呈现反社会性特质，与人类进步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因此，文学艺术家必须妥善处理世界观与创作的内在关联，将兼具现实关怀、社会维度与革命立场的世界观，深刻地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实现艺术天性与现实生活、革命诉求的深度契合与和谐统一。

#### 4 批评标准的人民性与革命性

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家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始终聚焦社会现实议题，怀揣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与民生关怀。他们将文学的功利性与目的性视作批评的核心准则，将人民性作为评判文学艺术家创作水准的关键标尺。作为文学领域的属于，“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的首次使用可追溯至 П. А. 维亚泽姆斯基。1819年他在致 А. И. 屠格涅夫的信中，首次使用“народность”（人民性）一词来阐释其诗作《初雪》（Первый снег）。（Святославский 2024：167）1824年维亚泽姆斯基再次使用这一概念并明确了其内涵：“一种只能通过体验，才能感知到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特质”。（Вяземский 1996：152）对别林斯基而言，“人民性”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他明确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唯有能够真实反映生活，才能算得上具有人民性”。（Белинский 1948：135），不过，其“人民性”概念具有相对性，是以西欧民族性为参照，涵盖俄国社会各阶层的整体性俄罗斯民族特质，呈现出鲜明的超阶级性。本质而言，别林斯基所倡导的“人民性”，更多指向与欧洲民族相对应的俄罗斯民族特性，并没有将现实与特定阶级和阶层联系起来。这一理论局限，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实践中得到突破性修正。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现实之美、生活之美及其本质与概念，并非具有普遍性的抽象存在，而是由主体的不同立场、生存环境与阶级属性所决定，并随生活境遇及各阶级对劳动的认知态度而变化。换言之，不同阶级秉持截然不同的审美标准与美学观念。在统治阶级视角下，贵族少女须具备“纤细的手足”“小巧的耳朵”，带有“病态、柔弱、委顿、懒倦”的情态，（车尔尼雪夫斯基 1978：543）方称得上“美”，甚至偏头痛这类疾病，也成为贵族阶层追捧的“雅致”象征。而在农民阶级看来，此类审美实则虚妄骄矜、趋于颓废的病态表现。

杜勃罗留波夫在继承车尔尼雪夫斯基阶级分析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文学的

“人民性”并非简单等同于民族性或时代性，而是直接植根于民众最关切的现实社会关系之中。他直言：“文学在许多地方促进了公众对自觉性与明朗性的追求。——我们在这一点上要给予充分的公正，为了不要过分的越出例子之外，我们只指出这一点：现在全俄罗斯所最关心的、把其余一切问题都远远推到后面去的——就是改变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杜勃罗留波夫 1983：148）杜勃罗留波夫不仅清晰界定了“人民性”的核心内涵，更深刻揭示了其鲜明的革命性本质。在他看来，文学的“人民性”思想，核心在于以人民的视角呈现其生活境遇、映照其现实诉求，传递人民为改变自身命运而抗争的精神力量，宣传奋起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理念。

与别林斯基所强调的民族性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突出的阶级性相比较，杜勃罗留波夫所倡导的“人民性”展现出更为明确的现实指向、强烈的批判意识与革命色彩。他通过对俄国艺术家群体与广大民众在数量上的悬殊对比，清醒地认识到在俄国文学中贯彻人民性所面临的困境：“一些人都渗透着这样的精神，虽然——再重复说一遍——在文学的内在的内容方面，还没有向前推进，它的思想的范围还没有扩大”。（杜勃罗留波夫 1983：210）因此，他主张必须以彻底且坚定的革命态度，将“人民性”作为评判俄国文学家的根本标准。在杜勃罗留波夫的理论视域中，文学艺术家不仅需深刻体认到“我们之所以站得住脚，只是因为在我们脚下有坚固的基础——真正的俄罗斯人民”，（杜勃罗留波夫 1983：245）更需明确创作必须贴近人民、为人民所理解，创作不应局限于某一阶层，仅反映少数人的诉求，而需立足于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视角阐释现实，并始终着眼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进一步阐释：“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去用人民所拥有的那种质朴的感情去感受一切”。（杜勃罗留波夫 1983：123）

可见，杜勃罗留波夫所界定的“人民性”，核心指向乃是农奴制压迫下普通民众的意志与精神诉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强调文学作品需真切传达人民性，更注重作品对民众的引导与启蒙，唤醒民众内心潜藏的、为改变自身命运而奋起抗争的力量。从这一维度而言，“人民性”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是艺术家是否将自身全部情感与民众的生存命运深度绑定的价值立场问题。正因如此，杜勃罗留波夫直言：“要是我们的文学发展进程，以果戈里为结束，那么可以说，我们的文学到现在为止，还几乎从来就没有完成过使命：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杜勃罗留波夫 1983：180）质言之，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民性”理论，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彰显出最为鲜明的战斗性与革命性特质。

## 5 现实的批评方法的革命性

作为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始终坚守文学的价值评判标准，秉持实事求是态度，恪守文学批评的真实性原则。他明确主张，批评家“对待艺术家作品的态度，应该正像对待真实的生活现象一样”，（杜勃罗留波夫 1983：256）需以客观可靠的评判尺度，明晰呈现作品的优劣得失，并为创作者指明前行方向，同时要“以文学作品为依据，解释生活本身的现象，而并不是把任何预先编纂好的观念和课题强加在作者身上”。（杜勃罗留波夫 1954：262）基于这一核心认知，杜勃罗留波夫将这种革命性的批评方法命名为“现实的批评”。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既须具备发掘天才与杰作的敏锐眼光，亦要有直面劣作、深刻批驳的勇气，敢于直陈其弊、不加讳饰，在批评实践中切实践行“现实的批评”方法。批评家需明确文学批评的功利性指向，强化批评表达的直接性，真正达成“批”之深入直接、“评”之全面准确的实践效果，从而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激发民众潜藏的革命性意识，推翻当时充斥着暴力与不公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消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隔阂。为达成这一目标，杜勃罗留波夫倡导将对作家塑造形象的美学分析，与探究这些形象的现实生活根源相结合，深入揭示作品形象的社会意义，引导读者深刻理解俄国社会现实，助力他们得出具有革命性的认知结论。《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黑暗王国》《黑暗王国中的一线

光明》《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四篇经典批评文本,正是杜勃罗留波夫“现实的批评”方法最生动、完整的实践范本。

在《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一文中,杜勃罗留波夫深入剖析了冈察洛夫的创作特质,称其为“善于把生活现象的完成性表现出来的艺术家”,其作品属于“客观的艺术创造”,并指出作品的核心成就在于“解开了俄罗斯生活中许多现象之谜的关键”。(杜勃罗留波夫 1954: 70)杜勃罗留波夫不仅重视并强调艺术典型性的独创性,更深入探寻了这种典型性得以生成的根源:人物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与具体社会环境。他通过“现实的批评”方法,将典型人物、典型性格与典型经历的生成背景,明确归因于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进而呼吁民众清醒认知自身阶级所遭受的压迫,推动革命性思想转化为实际抗争行动。《黑暗王国》一文则聚焦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的批判内核,深刻揭示了剧作对俄国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与彻底否定。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中,一切戏剧冲突和灾难,都是由于两个集团——老年的与青年的、富的和穷的、专横的和谦卑的之间冲突和结果”。(杜勃罗留波夫 1983: 283)在他看来,这个“黑暗王国”中没有真理与纯洁可言,唯有蛮横无理的野蛮与疯狂,唯有统治阶级的丑恶与欺诈,人类的尊严与自由、民众的个性与信仰,都不过是可被专横顽固的统治阶级随意碾碎的尘埃。杜勃罗留波夫着力凸显“黑暗王国”的腐朽本质,核心目的正在于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进而实现干预社会现实、推动革命运动发展的批评目标。

但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早期剧作中,杜勃罗留波夫并未发现具有明确抗争意识的典型人物形象,直至《大雷雨》问世,他才在作家的创作中“呼吸到了一种新的生命”。因此,在评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中,他明确指出《大雷雨》所彰显的蕴藏于民众之中的反抗精神,旨在唤醒民众普遍的抗争意识,引导人们认知抗争行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进而号召民众采取坚决行动,推翻俄国专制顽固势力的统治。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杜勃罗留波夫通览屠格涅夫的《前夜》,深刻洞察到俄国社会正处于艰难而痛苦的转型阶段。他敏锐地捕捉到叶莲娜与英沙罗夫形象所承载的俄国新一代进步青年的精神特质,并将二人身上所彰显的善,界定为“积极的善”。同时,他对俄国专制制度展开尖锐批判,明确将其视为一切社会不幸的根源:“归根结底——所有原因,又要归结于我们过去一切内部灾难的那个重要来源——对人们的奴役的统治”。(杜勃罗留波夫 1983: 132)所以,杜勃罗留波夫预言,俄国正面临着反对内部敌人的俄国的英沙罗夫出现的“前夜”,人民“不再被人家强力束缚在垂死的过去时代的死尸上”,(杜勃罗留波夫 1983: 133)真正的白天一定即将到来。可以说杜勃罗留波夫的这四篇评论不仅深刻地分析作品,完整地体现了“现实的批评”的创作方法,而且发展完善了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从根本上启发了广大俄国民众的革命性社会意识,直接指导了当时的文学运动和革命运动,充满了战斗性和革命性。

## 6 结束语

在 19 世纪俄国社会深刻变革的现实语境下,杜勃罗留波夫在传承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在理论发展和批评实践方面都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与创新。这种革命性思想贯穿其文学观始终:以唯物主义为根基,确立了服务革命、唤醒民众的民主主义美学原则;以人民立场为核心,构建了兼具现实指向与战斗属性的“人民性”批评标准;以革命诉求为导向,强调作家需树立与时代同频的革命性世界观;以“现实的批评”为方法,实现了文学批评对社会现实的深度干预。他的四篇经典批评文本不仅是其理论主张的生动体现,更是将文学批评转化为推动变革、反抗专制、唤醒民众的精神武器,为俄国文学运动和革命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思想指引。杜勃罗留波夫的理论不仅丰富了俄国现实主义文论体系,更彰显了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与实践品格,文学既是现实的镜像,更是变革的先导。其思想至今仍启示我们,文学与批评应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回应时代命题,以思想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这正是其文学观革命性的永恒价值所在。

## 参考文献

- [1]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Собр. соч.: в 3 т.[M]. Москва: ОГИЗ-ГИХЛ, 1948.
- [2]Вяземский П. А. Разговор между Издателем и Классиком с Выборг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или с Васильевского острова: вместо предисловия к «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ому фонтану». 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20–1827[M]. СПб.: Гос. Пушкинский театр. центр, 1996.
- [3]Жданов В. 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 [M].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5.
- [4]Святославский А. В. Категория народно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ак предмет осмысления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и XIX в.[J]. Два века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ки, 2024(6).
- [5]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上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 [6]列 宁. 列宁全集：第 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7]列 宁.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 1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 [8]杜勃罗留波夫.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 1 卷[M].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
- [9]杜勃罗留波夫.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 2 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10]李建军. 黑暗王国的一道闪电——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J]. 扬子江评论, 2017(5).
- [11]邱运华. 俄罗斯文学选读[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On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in Dobrolyubov's Literary Views

Peng Yong-tao

(Department of Russi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a core representative of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n important promoter of realist literary theory in mid-19th century Russia, Dobrolyubov inherit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the realist literary tradition and materialist aesthetic thought initiated by Belinsky and Chernyshevsky. He not only established the core creative principles of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aesthetics, highlighted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writers' worldviews in literary creation, and demonstrated the practical value of unifying revolutionary spirit with people's nature, but also enshrined "criticism of reality" a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and criter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laying a crucial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mat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Russian realist literature. His distinct and unwavering revolutionary ideas permeated his aesthetic, literary,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establishing clear norms for Russian literary creation of the era while profoundly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subsequent literary criticism. His legacy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Russia and beyond Europe.

**Key words:** Dobrolyubov; people's nature; revolutionary spirit; literary criticism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诗学学派研究”（22&ZD28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永涛（1991—），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2025-04-09

**[责任编辑：刘 锐]**